

《反杜林论》 哲学编内容提要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印

一九八二年五月

《反杜林论》写作的历史背景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在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论战中，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部伟大著作。列宁曾指出，《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列宁选集》第1卷，第92页）它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间，先以论文形式陆续发表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前进报》上，1878年7月汇编出版。这部著作决不是恩格斯“内心激动”的成果或“纯学术争论”，而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的产物。恩格斯在初版序言中，对这本书的写作原因作了扼要的说明。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这一时期，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在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各国党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准备未来的战斗。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中心，已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

德国在1871年统一之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加深，无产阶级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蓬勃高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工人政党实现统一，对统治阶级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德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一方面积极支持俾斯麦政府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各种浅薄庸俗的折衷主义，企图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这时，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接近社会主义，而又调和阶级矛盾，反对革命

斗争：既想从理论上概括飞速发展的各门科学，而又坚持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滥造了种种“体系”，冒充科学权威，妄想出人头地。杜林就是这种假科学在工人运动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柏林大学讲师杜林（1833—1921），从1867年起就攻击马克思主义。1875年前后，他以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著书立说，扬言要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加猖狂的攻击。他鼓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谬论，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散布庸俗经济学反动观点，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肆意歪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用反动的伦理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杜林是马克思主义当时最危险的敌人。

杜林的反动思想直接危害着当时德国工人党的健康发展。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那赫派，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但是在理论上还很不成熟。1875年，它在同拉萨尔派实行合并时，由于无原则妥协，没有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因而在党内滋长了对机会主义的迁就情绪，使杜林的反动理论得到了泛滥。有名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莫斯特、恩斯和弗里切等，都成了狂热的杜林分子。他们无耻地赞颂杜林是“科学领域内最热心、最勇敢、最勤奋的首领”，称杜林的著作是“划时代的著作”，并且采取阴谋手段，迫使党的《人民国家报》发表他们吹捧杜林的反动文章，妄图把杜林的荒谬理论散布到工人群众中去，这些人和杜林勾结一起，形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小宗派，阴谋篡夺党的领导权，分裂党的组织，另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更为严重的是，杜林对资本主义不痛不痒的“批评”和对共产主义的虚伪“称赞”，甚至骗取了党的左派领袖倍倍尔等人的支持和信任。倍倍尔在1874年就匿名发表文章，称赞杜林的“基本观点是卓越的”。党的刊物也转载杜林歪曲马克思学说的著作。这样，就给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那时的德国工人阶级，居于国际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前列，如果让杜林之流的阴谋得逞，也将会给整个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危害。

在这种情况下，彻底批判杜林，捍卫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就成为德国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恩格斯指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力量，第一个条件是不让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受到危害。而杜林博士却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于是，恩格斯便放下《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写作，着手对杜林进行批判。

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的过程中，得到了马克思的积极赞同和协助。1876年5月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研究对杜林的批判问题，马克思立即回信说：“我的意见是，要不顾一切，批判杜林。”（《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500页）马克思积极协助恩格斯收集有关资料，看过这本书的全部手稿，并且亲自写了政治经济学编第十章，批判了杜林关于经济学说史方面的错误。所以说，《反杜林论》所阐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共同的观点。

杜林的社会主义是以所谓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形式出现的。恩格斯为了彻底粉碎杜林的“体系”，清除当时德国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学说“体系”的影响，并在批判中充分发挥自己对每个问题的科学见解，在《反杜林论》中涉及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恩格斯总结了《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三十年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 and 自然科学的成就，以百科全书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内在联系，集中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所达到的成果。全书围绕着科学共产主义这一核心问题，全面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剩余价值学说，并运用这些原理深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反杜林论》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崇高的战斗风格，是

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反杜林论》的发表，粉碎了杜林一伙的进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加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了党的统一和团结。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反杜林论》一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因而也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在反对杜林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恩格斯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恩格斯向当时德国工人党的领导人指出：“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只有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才能经受住阶级斗争的严重考验，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先锋作用。

三 版 序 言

第一版序言主要讲《反杜林论》一书的写作原因、经过和涉及的范围；第三版序言说明新版对个别章节的修改。这里着重介绍第二版序言。

在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首先概述了本书大量发行的原因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影响，说明新版的修改情况，然后着重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及其自然科学基础，指出了学习辩证法的重要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是自然观上的革命变革。十七至十

八世纪，在自然科学领域，孤立、静止、片面地观察事物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占统治地位，这是同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相联系的。十九世纪初，黑格尔第一个自觉地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辩证法是淹没在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在他看来，辩证发展的只是“精神”，自然界则是僵死不变的，他的自然观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马克思和恩格斯剥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吸收其中的合理内核，“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必须具有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象旧的自然哲学那样，“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曾花费巨大的精力，研究各门自然科学，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规律。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是有其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的。恩格斯概述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指出自然科学的许多新发现，如“真正”气体的液化、热运动的计量、能量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和细胞学说的建立等，清楚地说明了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只具有相对意义。唯物主义的辩证自然观正是对于这种客观规律的自觉反映。那种赋予事物之间的区别、分类以固定性质和绝对意义的见解，不过是人们把自己主观思考中的片面观点加于自然界的。“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一致的、最适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

最后，恩格斯强调了自然科学家学习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意义。十九世纪初，自然科学已逐步由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发展到

了系统地综合整理材料的阶段。可是，到了八十年代，自然科学在理论方面仍被当时流行的折衷主义、形而上学统治着。理论自然科学的革命变革，单靠自然科学本身越来越多的发现，当然也可以自发的实现，不过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如果自然科学家学会了辩证法，进而自觉地去研究事物的辩证性质，就比较容易达到对自然过程的辩证认识，从而大大缩短这个过程。因此，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家应该认真研究辩证哲学，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只要自然科学家努力掌握二千五百年来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即掌握唯物辩证法，那么自然科学就会较快地摆脱凌驾于其上的自然哲学，摆脱从十七世纪英国培根和洛克等人那里沿袭下来的形而上学。对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作了精辟的论述，并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这就是说，要掌握辩证的思维方法。

引 论

一、概 论

《概论》主要是论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围绕这一中心，恩格斯阐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思维方法的对立，阐明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思想及其创立的意义，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概论》是学习《反杜林论》的一个总纲。

（一）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第56页—第59页第1段）^①

现代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经济根源和思想来源的。

^① 此页码和段落划分都是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的页码和自然段落。

就其内容来说，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立的反映，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考察的结果；而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的初期形态——空想社会主义，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理性原则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家。为了给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他们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对封建制度以及为这一制度辩护的宗教、法律、道德等各种传统观念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们认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是合乎理性的，是永恒真理；而过去的一切社会形式、国家制度和传统观念都是违背人类理性的，必须统统抛弃。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这种批判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启蒙学者不是把生产方式，而是把理性看作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这种历史观点则是唯心主义的。他们的所谓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十八至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正是把这种理性作为理论出发点的。

在资产阶级开始反对封建贵族的时候，广大无产者群众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就存在了。伴随着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先后产生了莫尔、康帕内拉、摩莱里和马布利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十九世纪初，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学说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抨击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社会的图景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猜测。他们要建立的理性王国，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受苦群众的一定愿望，同启蒙学者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理性王国有着天壤之别。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一样，也是不合理性的，必须把它抛弃。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有其合理的部分，因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

但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发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未充分展开，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只好求助于理性，凭空构思新社会的轮廓。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唯心史观。他们认为，人类“理性”或“天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把人分成两部

分，即高出于社会之上的个别“天才人物”和“无所作为”的广大群众。在他们看来，自己是超乎阶级对立之上的，是全人类的解放者或救世主；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考察的结果，而是个别“天才人物”发现的永恒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这种“天才人物”的出现，不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是一种纯粹偶然的现象；社会主义的实现不需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而只靠对剥削者的说服劝导就行了。他们始终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和革命道路，因此，他们的学说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头脑虚构出发，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现实基础出发，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揭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这样就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和 唯物辩证法产生的意义

（第59页第2段—第65页第1段）

社会主义学说的变革同哲学上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必须要有德国的辩证法，否则，“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因此，恩格斯在《概论》中，紧密联系自然科学和人类认识的发展，用很大篇幅阐述了两两种思维方法的对立和唯物辩证法的产生。

在人类认识史中，关于事物发展的法则，从来就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对立的见解。辩证法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在同形而上学的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古代的朴素辩证法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种世界观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但是，它只能直观地、笼统地把握现象总体的一般性质，而不能说明构成总体的各个细节，它还缺乏精确的科学根据和分析。正由于古代辩证法具有自发的朴素性质，后来就被形而上学代替了。

十七至十八世纪，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居于优势地位。这在当时是不可能避免的，因为自从十五世纪末叶以来，自然科学为了研究自然界的各个细节，就把它们从总的联系中分离出来，对其特性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研究使人类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却使人们养成一种孤立、静止、片面地观察事物的习惯。一些哲学家又把这种方法当作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自然科学领域搬到哲学领域，于是就造成了西方近代哲学形而上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否认事物的联系和变化，把一切对立和区别绝对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正与负、生与死、原因与结果等，永远处于绝对的对立之中。“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常识在日常生活中是可取的，但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立刻暴露出它的缺陷。当对事物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就会发现，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变化发展之中，任何对立都是相对的。生与死、正与负、原因与结果等对立的双方，总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并相互转化的。自然科学越来越多的新发现突破了形而上学的框子，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要精密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使辩证法得到了高度发展。黑格尔第一次自觉地叙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把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企图揭示这种过程的内在联系。按照这种观

点，人类历史不是偶然现象的堆积和暴力行为的结果，而是有规律的，思维的任务就在于透过偶然现象去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但是，黑格尔没有完成这一任务，除了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主要由于他是个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辩证运动的主体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是一种神秘的“绝对精神”。因而，他的辩证法就不可能是彻底的。黑格尔一方面把人类历史和认识看作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而另一方面又宣称，普鲁士王国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他的哲学就包括了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这种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黑格尔体系的流产。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部分，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使辩证法成了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唯物辩证法，不仅承认自然界有自己时间上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这样一来，不仅自然科学而且社会科学就彻底摆脱了旧哲学的束缚，从而为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

（三）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 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第65页第2段—第67页）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了首要地位。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以及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阶级斗争的事实日益清楚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等说教纯粹是撒谎，必须彻底抛弃。可是，“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不知道生产和经济关系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的唯心史观，依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在这

种历史条件下，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社会历史，批判了唯心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唯心主义就最终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里，这种矛盾集中地表现为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因此，社会主义就不再被看做是个别“天才人物”的偶然发现，而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在于研究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及其相互斗争的规律，为无产阶级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

以前的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同唯物史观是根本不相容的。它们只是痛斥资本主义的罪恶，而不能深刻揭露这种罪恶的经济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现了剩余价值，从而彻底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及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向资本家提供的价值量，要比工人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价值量大得多，这个大出的部分就是由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因此，对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对工人剥削的基本形式。按照剩余价值学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占有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这就使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和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从而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

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在科学社会主义早已创立并日益被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所掌握的情况下，空想社会主义的模仿者杜林，竟然跳上舞台，扬言要在科学上实行所谓“全面变革”，要从他那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思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标准”体统。这不仅是极端的无知，而且是十足的反动。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这一章主要是揭露杜林的高傲与无知。杜林自吹自擂，向人们许下了诺言，胡说自己的思想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是“穷根究底的理论”，并使经济学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变”，等等，把自己打扮成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个超人。他对于一些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则采取粗暴蛮横的否定态度，特别是对马克思进行了恶毒的谩骂和攻击。恩格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编中，通过雄辩的论证和大量的事实，彻底批驳了杜林的谬论，戳穿了他的全部谎言。

第一编 哲 学

杜林的社会主义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形式”出现的。因此，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理论时，首先清算了它的哲学基础。在哲学编中，恩格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列宁说：“恩格斯同杜林的全部斗争始终是在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这个口号下进行的。”“在《反杜林论》的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单行本，第339页）

哲学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在《分类。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中，围绕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物质和意识或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阐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高度发展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的唯物主义原理。恩格斯提出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等著名论断，彻底划清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的根本界限。

自然哲学部分，围绕物质的存在形式问题，着重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观点，深刻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和运动观。恩格斯提出并阐述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以及“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等重要原理。坚持这些原理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抵制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侵袭的必要条件。

道德和法部分，批判了杜林在道德和法方面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阐述了道德和法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些原理。恩格斯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只能是“消灭阶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等。

辩证法部分，驳斥了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攻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则区别，论证了辩证法的规律。恩格斯提出了“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著名原理，阐述了矛盾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给唯物辩证法下了一个科学定义：“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恩格斯深刻说明了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三、分类。先验主义

这一章，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批判了杜林从原则出发构造现实世界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划清了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界限。

(一) 批判杜林从原则出发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阐述思维是对外部世界反映的唯物主义观点

(第73页—第75页第5段)

杜林把哲学对象分成了三类，即一般原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他认为，存在和意识的一般原则先于经验，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之前，它们是构成各种知识和事物的“终极成分”或“基本元素”。这些原则一旦被发现，就可以用来说明一切，只要把它们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就应当与之相适应。于是，他就按照“原则走在前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跟在后面”的“逻辑次序”，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分成了世界模式论、自然哲学和人的学说三个部分。对杜林哲学体系的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原则，恩格斯进行了深刻批判。

恩格斯指出，作为杜林哲学出发点的所谓原则，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从他的头脑中臆想出来的。这种先于事实，脱离实践，从原则出发来构造知识和世界的观点，是一种和唯物主义反映论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对唯物主义来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外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思想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关于外部世界的原则，绝不是思维自身想象的产物，而只能是思维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这一精辟论断，深刻地阐明了思维和存在、主观认识和客观对象的真实关系。杜林关于原则先于物质世界，从原则出发来构造现实世界的

荒谬观点，不过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抄袭和模仿。

杜林割裂意识和自然界、思维 and 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关系，把思维看作是脱离自然和人，从一开始就和自然界相对立的某种现成东西。恩格斯批驳了林杜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深刻地阐明了意识或思维产生的物质根源，进一步论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出，思维和意识，只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这清楚地说明，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倒是物质的最高产物。思维是人脑的机能，根本不能离开人和自然界而独立存在。因此，“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意识和自然，思维 and 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它们相互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遵循着同一个辩证的运动规律。那种脱离自然界和人的思维，不是别的，不过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变种，上帝的别名而已。

（二）批判杜林的形而上学的“终极真理”

体系，阐述人类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第75页第6段—第76页第1段）

关于存在形式的先验原则，是杜林哲学的基础。杜林鼓吹先验原则的一种狂妄企图，就是要从某种神秘的概念或原则出发，来构造现实世界，建立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所谓“终极真理”的哲学体系。恩格斯批判了杜林这种形而上学谬论，论述了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正的科学认识并不是头脑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对外部世界及其规律的反映。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而是人类在实践中由浅入深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恩格斯指出，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并推动科学从部分到整体一步步地揭示世界各种过程的内在联系；而且就无限世代的人类来说，也具有认识整个世界一切联系的无限能力。但是，对无限世界

作恰如原状的、毫无遗漏的科学陈述，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其他任何一个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这就是说，人类总是力图认识世界的一切过程和联系，而世界体系则是无限的，事物的联系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一定时代的人对它的认识是无法穷尽的。同时，人类本身的无限认识又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人来实现的，而每个人由于受历史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制约，其认识总是有限的。这种矛盾只能在人类无限发展的前进中不断地解决；它推动人们不断实践，不断认识，是人的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

杜林对认识过程中的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辩证法根本无知。他离开认识的相对性和有限性，只讲认识的绝对性和无限性，从而陷入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他狂妄宣称，自己的哲学是完成了绝对真理认识的“终极体系”，解决了科学的最终任务。事实上，这就等于封闭了一切科学向前发展的道路。

（三）批判杜林在数学问题上的先验主义， 阐述理论思维对现实世界的依赖关系

（第76页第2段—第79页）

杜林认为，和存在的基本原则一样，纯数学也是先验地从人的头脑中构思出来的，它的对象是思维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他把纯数学看作与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以此作为自己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重要根据。恩格斯批判了杜林这种先验论观点，通过分析数学对现实世界的依赖关系，进一步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

恩格斯指出，数学具有脱离任何个人特殊经验的独立意义，但它决不是先验的。纯数学为了反映外部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必须把数和形同客观内容的联系暂时撇开，从现实中抽象出来，以便在纯粹状态中研究抽象的数，研究没有长宽高的点、没有宽度